

(一)「文化」與「文明」

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的〈弁言〉中說：

文化和文明兩辭，皆自西方移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屬於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於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向外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積業而產生。¹

錢穆教授此書初版在 1948 年至今已七十多年了，但文明和文化兩詞混用不僅未絕於耳，且有擴大化的趨勢。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兩點。其一是這兩個詞語雖有明顯和根本的區別，但也有某些相同的地方，均可以用於指「人類群體生活而言」。其二是有些人對這兩個詞的內涵沒有深究，甚至把它們看作是完全可以互換使用的詞語，社會上對此也

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久而久之，便習以為常了。當然，也有人有意把它們的區別模糊起來，以便於完己之說，以達到某種學說自圓其說的目的，我們會在下文略加分析，以引起大家注意。

當然，文化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概念，涵蓋的面十分廣泛。從廣義上說，它既可以是表述人類在生活實踐中所產生的一切精神和物質的成果，也可以是僅指某一集團的「語言、傳統、習慣和制度……」¹而文明又可以由文化產生，但文化卻不能由文明的傳遞而立刻形成。比如現代由於通訊網絡發達和交通運輸的方便，作為「文明」的科技產品很容易傳播，但生成這些文明產品的文化，往往不能隨着產品一起馬上傳遞，²所以把「文化」和「文明」的混同使用，對分析社會和人文現象就會產生一些錯誤的判斷。因為在目前的世界，國家與民族之間物質生產能力和他們的文化狀況並不存在相對應一致關係。科技生產能力高者可以說他們是「文明程度高」，但不能以此類推，科技生產能力比較低者就是「文化程

1 按照《大英百科全書》提供的西方資料，被稱為文化經典定義是：19 世紀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伯內·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原始文化》（1871）一書提出的：「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以及人類作為社會成員所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習慣。」Tylor, Edward Burnett.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Vol. 2. J. Murray, 1871.

2 我們在這裏對「文明」和「文化」問題還有說明一點。現代世界隨着通訊網絡的發達，西方國家利用發達的傳媒，推銷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產品的優越，實際也是對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的一種新的殖民政政策。本書在第四章中有具體評述，故在此省略。

1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 年 2 月版，1 頁。

度低」。特別是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和民族，剛剛脫離殖民主義的束縛，他們的科技生產能力不高，但並不等於他們的文化低下，他們所具備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物質文化遺產，同樣是人類重要的財富。我們特別反對以科技、文明程度高為條件，利用科學技術和經濟的強勢，霸佔國際市場的生產和銷售渠道，控制重要自然資源的生產，並通過結盟等手段，建立區域性的新圍堵計劃，打擊第三世界和一些民族國家的崛起，在世界推行新的霸權主義，甚至不惜挑起國際紛爭和衝突。

在談論「文化」和「文明」這個概念認識的時候，我們不妨回顧在中國歷史文化中有關方面積累，從中啟發我們今天思考。

在《易》中，有「形而下謂之器，形而上謂之道。」這是在中國古代很早就形成的一種哲學理念。我們從最簡單的角度認識這個概念，便可知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明白，在天地之間，存在物質和精神這兩種最重要的、不同的東西。而人要獲得生存之道，就要「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亦即說人要生存得好，首先就要不斷追求認識大自然，從而達到順天而行的境界。然後在對人類社會方面，則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見中國人在早期逐步認識到我們的地理環境和物質自然條件，適合農業社會，所以最後選擇了大農業的生產形態，並配合中央集權的王朝形式，延續了兩千多年。

中國在漢代為了適應中央集權的王朝需要，把上古的歷

史文化進一步整理，便出現了「獨尊儒術」的局面。自漢武帝之後，儒家思想便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直到清代王朝的終結。在此應該說明的是中國的「獨尊儒術」並非只有儒家保存，只是儒家佔有領先的地位。我們若觀察漢代及以後的朝代中，道教、法家，以及春秋戰國時期各家各派的重要思想精華，大都糅合到儒家的體系中，它們的渠道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漢代的文化成就，除了從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方面鞏固了秦代開創的中央集權王朝制度之外，對形成以漢民族為核心的中華民族以及形成中國的國家版圖，亦是非常關鍵的年代。中國漢代王朝與西方羅馬帝國當時為世界並存的兩大帝國，並非浪得虛名，而是有充分的歷史成就作根據的。而中國歷史上的文化成就，則是哺育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原因。

本書第二章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宏觀線索」，第三章是「地域歷史文化研究」，我們希望從中國文化發展的宏觀線索和區域歷史文化發展的歷程，說明中國王朝為什麼能延續兩千多年，為什麼古代的中國並非像西方羅馬帝國一樣無限擴張領土，企圖成為世界的霸主？也不像後來崛起的一系列西方國家那樣，隨着工業革命走上殖民之路？從世界歷史來看，歷史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走向的重要基因。

本書試圖回答一個問題：中國歷史文化和文明發展如何延續了兩千多年，特別是中國歷史文化如何形成一種發展的機制，使中國的社會文明在明代以前，甚至在清朝的大部分

時間裏都能領先世界？過去我們往往僅從中國形成大農業的生產方式去說明中國歷史發展的合理性，忽視了它的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曾經存在的許多方式，它們曾經巧妙地配合了我們歷史文明的發展。我們曾經用現代的眼光把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寶貴東西看作糟粕，沒有從歷史的時間和空間角度看問題，放棄了我們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經驗。鑒於目前我們正處於民族重新崛起的大時代，所以要特別提出認真繼承和總結傳統歷史文化的問題，作為一種時代的呼籲和策略。

當然，我們今天重提「文化」和「文明」，並非只是訴說歷史而已，而是提醒大家，這兩個詞的內涵還可以讓我們眼睛擦亮，看清一些國際宣傳言論的真正目的。尤其是在舊殖民體系崩潰以後，它的幽靈正在借屍還魂。它雖然變了表面，但扼殺民族文化，企圖利用文明的物質優勢建立新的霸權體系，其壓制民族國家崛起的目的仍然是不變的。

從我們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經驗來看，文化與文明可看作是一對陰陽的組合，但它各有特性和功能，不能混淆，但可互相調節和影響。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我們可以根據社會的發展需要，則重（傾斜）某一方面，但是卻不能無限制地側重和片面的發展，這樣就有引起由於「過猶不及」的不良效果。我們認為，當前西方憑着工業革命以來的文明發展，在舊殖民結束的時候，還不惜一切地強化物質生產的能力，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了保持在殖民地時代所得到的權力和利益，除了用物質的強勢企圖建立世界霸權的新體系，還借

用「軟實力」，特別是傳播媒介和學術研究，發出強勁的攻勢，佔領了不少陣地。環視今天世界的社會物質生產，已經大大損害了地球人類生存的條件，尤其是氣候的變化和疾病的傳播已經有明顯的徵兆。為此，本書第四章「西方幾部有關文化研究著作的述評」，對當代西方幾種文化理論著作進行剖析，以期引起大眾的關注。

我們認為，世界民族和國家的文化，由於地理、歷史和形成的時代不一樣，其文化和文明都存在不同。隨着科學技術和交通事業的發展，必然會產生互相交往和貿易，文化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我們應當在世界舊殖民體系結束的時代共同構建一個新的世界格局，而這個格局的基礎首先應該是尊重各民族和國家的獨立自主，特別是尊重他們的歷史文化傳統，在物質生產方面，亦不能利用自己的文明優勢，控制或濫用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源，把過度利用自然資源的不良後果轉嫁到他們身上，從而建立一個新的霸權體系。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延續不間斷歷史文化發展的紀錄，它是在中華民族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實踐，不斷自我完善，亦有與世界其他民族長期交往和交流的經驗而得出來的，應是世界文化歷史的重要寶貴財產，對世界未來的發展，應存在重大的啟迪意義。我們絕不應該因為在近現代的歷史中走了一些彎路，曾經迷失了方向而忘記了我們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和文明方面的成就。正如湯恩比曾在上世紀 70 年代曾說中國有「遲緩的優勢」。他正是看出了中國在物質文明生產暫時落後，而歷史文化資源豐厚，如果能認真看

清形勢，奮起直追，有可能探索走出一條超越西方的路。¹

本書主要是探索中國歷史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如何形成自己的體系和特點。它包括中國歷史文化的宏觀線索、兩個宏觀線索下的個案：一個是區域歷史；另一個是專題歷史。它們之間無疑有着密切的關係，但又各有其自身的特點。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是近三十年西方關於文化和文明的論述，選評了三部作品雖然出自不同的國家和背景，但都是與西方研究舊殖民時代結束世界格局走向的文化內涵有關。本書把它們與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放在一起，讓大家好作比較，明白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提出繼承中華文化傳統的口號。在認識的基礎上，還必須明白要繼承文化傳統，就必須下大功夫，同時還需進一步認識現在西方認為中國是他們實行「全球化」計劃的頭號障礙，他們對中國設置各種刁難是必然的。相信大家可以從本書的敘述中了解到中華民族的形成及歷史文化形成特質，是與西方今天的霸權主義完全格格不入的兩種文化。

（二）歷史文化研究方法簡論

首先要說明的是，這並非一部史學理論著作而只是題材屬於歷史文化的作品，是屬於筆者在多年講授有關歷史文化

¹ 本書在第二部分還會再論湯恩比關於中國潛在「遲緩的優勢」的問題，故在此不展開分析。

課程時常常涉及的一些理論和方法，並非史學的新理論，而是「老生常談」而已。不過，若從今天史學和人文社會學科的實際狀況來看，還是有一些現實的需要和意義的。因為社會的浮躁作風已經侵蝕我們的學術研究，而急功近利，求名上位心切的現象已經開始蔓延，能夠靜靜坐下來認真做學問的已經不多了。因此溫故而知新，把一些重要的理論、方法認真了解，看來仍然是很有必要。

（1）「時」「空」概念

研究任何歷史，「時」「空」概念應是首要的因素。

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文物等等，無不與歷史時間緊密相連，所以確定它產生、發生的歷史時間，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條件。關於這方面，恐怕一般人都會是懂得的。但是，在「時」的概念上，僅知如此簡單的層面往往是不夠的，特別把歷史看成是一種學科知識時，這種認識的程度就更顯得不夠了。我們應當在研究中把研究對象的時代背景，尤其是與課題直接相關的部分了解清楚。當然，在這過程中，可能你會發現，前人在某些方面存在沒有注意或模糊不清的地方，亦可能有些新的資料發現而改變了傳統的看法……這些新的因素的出現應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並進行分辨。

在「時」的概念方面，我們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就是在歷史文化研究中，亦會遇到今人與時人認識上的差異甚至是對立。我們應當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鋪陳不同的看

法，不用迴避，這才是促進學術研究前進的正道。

「空」的概念實際就是指地點。地點對歷史文化的產生和變化都會起着重要的影響。歷史地理學就是研究地方在歷史過程中的變化和影響的學科，是我們歷史學最接近的學科。我們要注意的是，「空」不光是一種地域的自然環境因素，還包括歷史上各種社會因素，其主要的就是我們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我們從中國繪畫歷史的發展就可以看到，中國人很早就注意到「天、地、人」是我們生存的重要空間。¹我們中華民族對空間的重視，主要是中國經歷了漫長的大農業生產時代，無論是黃帝與百姓，都懂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對切身利益的重要影響。

(2) 以史為鑒

「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鑒，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鑒亡矣。」²

這是記載於《新唐書》上唐太宗在魏徵死時所說的話，後人把它歸納成四字的警句：「以史為鑒」。據商代的甲骨文記載，「史」字當時已經出現，它就是當時的史官，是掌管保

藏國家典籍、記錄王命、著述歷史的官員。商代已有史官作冊，到了周朝，王室有「太史」「內史」；諸侯國有「國史」。秦漢之後的史官是泛指修史之官，稱為「太史令」。三國的魏設「著書郎」為史官。後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均置「著作郎」（北周稱「著作上士」）、「佐著作郎」（南朝宋後稱「著作佐郎」，北周稱「著作下士」）。唐朝的史館沒有常設官，凡有修撰大事，每由它官兼之，有監修、修撰、直館等，事完則官罷。宋、元、明、清稱為修撰，編修、檢討。翰林學士兼任史事，亦有「太史」之稱。¹

由上述可見，「史」在中國上古歷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與文字的產生和發展息息相關，又是非常接近社會管理的核心人物，而本身就是社會文化精英，因此可以說，《二十四史》就是中國王朝文化中的「史鑒」。

在中國史學著作叢書中，《二十四史》佔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文獻地位。它由著名的司馬遷《史記》開始，到《明史》結束，一共包涵了二十四部獨立的、以朝代順序為先後的史學著作，而它絕大部分是以朝代為分野，是以後朝編寫前朝歷史的方式進行，展示了中國史學以史為鑒的傳統和延續。《二十四史》因此又被稱為「官史」。

當然，我們承傳中國歷史文化應該首先是懷有非常珍惜歷史文化的基本態度，但卻不是單純的懷古和復舊，而是繼

1 在中國長沙馬皇堆一號漢墓的考古發現中，就有一幅以天、地、人為題材的繪畫，形象地表達了中國人在古代對人生存空間的概念。

2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一零·列傳·第二十二 魏徵》，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1 參看張政娘主編：《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344頁。

承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時並進。要達到這種目的，必須對歷史研究有一種認真、科學的態度。

我們把「歷史重構」，看成是以史為鑒的第一步。要借鑒歷史，首先就要尊重歷史，努力把歷史的真實還原出來。歷史最大的特點就是已經過去的事情。由於有各種社會和個人的局限，使歷史往往不能把它的面目完完全全再呈現出來。我們只能用盡最大的努力去追求，使我們的認識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所以我們研究和編寫歷史，用「歷史重構」去表述。

要重構歷史，第一是對史實真實性的不斷追求；第二是採用科學性強的理論去建構歷史。因此我們看到，歷史學家們會不斷地對同一個歷史問題反覆研究，特別是當發現新的歷史資料的時候。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對歷史文化的認識，更是如此。這是因為歷史文化它往往是來自傳承，因此不但要認識它的今天，還要認識它的昨天，必須要把它從源頭開始認識，才能把它的特性、發展狀況了解得清楚，也就是說我們要以史為鑒，就要「溯本追源」。

(3) 溯本追源

「溯本追源」從中國歷史文化源流的角度看，實際就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提出的「通古今之變」。¹ 司馬遷身為史

1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引自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2735頁。

官，既負有朝廷的「王命」，又負有個人職業上的「史命」。他認為要完成這種記錄歷史給後世作參考的重任，就必須首先要深入了解歷史的整個過程，從始到終，這樣才能看清楚重大事件、人物和歷史變化過程的脈絡和性質。司馬遷這種歷史觀，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兩千多年，而《史記》也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寶貴典範。

我們當代人常用牛頓寫給胡克信中的一句話去形容做學術研究，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看得更遠。所謂「巨人」是所有前人的意思。其實，重視前人的成就和歷史經驗在中國文化中是十分突出的。且不用說太遠，就是在清代，雖然是滿族當政，也曾發生過多起「文字獄」事件，從整體來看，對中華文化的承傳和延續來說，還是正面大於反面的。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

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蔥蔥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又說：

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卷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